

# 秦漢六朝時期越南的開發

呂 士 朋

## 一 簡介秦以前的越南社會

百越民族在先秦時期本是中國東南土著民族的主幹，從現在浙江、福建、廣東、廣西以至越南東京（北圻）、安南（中圻）一帶，都是百越民族居住之地。越南民族則是百越民族的西支，周時稱駱越，秦時稱西甌，漢時稱南越或甌駱或西甌駱。（註一）按駱越之稱，係因「駱田」或「雒田」之稱而來，水經注卷三十七葉榆河引交州外域記曰：

「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為雒將。雒將銅印青綬。」

又史記卷一一三南越尉佗列傳索隱曰：

「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

至於「甌」本海南島土著之稱，其俗和越人相同，故甌越連稱。而居住在廣西南部和越南的越人，在甌之西，乃有西甌之稱。史記卷四三趙世家：

「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索隱引劉氏云：「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謂甌越。」（註二）

秦朝略併以前的越南社會，是一種有階級的封建社會，與今日越南北部黑河流域同東京，老撾分界諸山所見擺夷，茫（Muong）諸族的社會相類。當時的雒民（駱民），組織有一個村莊或數個村莊的團體，每個團體以世襲雒將（駱將）一人治之，雒將服從雒侯（駱侯），雒侯又服從雒王（駱王）。物質文明方面，他們用石鋤墾殖田地，每年收穫兩次，知道利用潮水上下所致的河流漲落而灌溉田畝（見前引水經注卷三十七文）。至於軍器，他們用幾尺長的大弓和毒矢，製造毒藥的方法是祕而不傳的，他們也知道鑄銅作箭鏃。他們有咀嚼檳榔同染黑牙齒的習慣，宗教是一種農田宗教，婚姻則有兄死弟妻其嫂的風俗，這種風俗在東京西部（今宜光江谷地及黑河下流地，即漢之甌冷）和清化西北一帶（漢之都龐），在西元三世紀時仍然保存，（註三）此外銅鼓之鑄作，龍舟之使用，文身的服飾，其為古代百越民族所表現之文化特質，駱越民族類皆有之。（註四）

## 二 秦漢時期越南（秦之象郡、漢之交趾、九真、日南）的開發

秦始皇統一中國（西元前二二一年）後，即着手略取南越，其動機據說是為了「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等珍寶。（註五）但遠征作戰，情況極為艱苦，初次進軍遭受重大失敗。

至西元前二一四年，二次進兵，才把南越平定。設置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南海郡約當今廣東省地，桂林郡約當今廣西北部同中部，象郡則包括今日越南北圻及中圻之大部，南至今之伐勒拉角（Cape Varella），北界稍逾今日兩廣之南界。（註六）

秦朝對象郡的統治，與南海、桂林同等，由於土著人民社會組織和風俗習慣的特殊，雖置守令，但直接統治，仍委諸當地土酋（雒侯、雒將）舊有的世襲雒將制度予以保留，朝廷所派的郡守，祇是居於監督的地位。（註七）同時政府遣戍大批移民，使與越人共處，以促進越地的開發，此種遣戍工作，自南征之初即已開始。史記卷一一三南越尉佗列傳：

「秦時已併天下，略定揚越，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徐廣註曰；「秦併天下（前二二一年）至二世元年（前二〇九年）十三年。」

秦朝統治三郡十餘年，初次促進中越文化血統的融和，亦為此後中國千餘年開發郡縣治下的越南，奠立初基。

秦末趙氏南越王國的建立，對於越南歷史文化，其影響與貢獻更大。南越武帝趙佗，原籍真定（河北正定），據其漢文帝元年（西元前一七九年）報漢文帝書，自謂處粵四十九年，（註八）是其遠在戰國末年（前二二八年），亦即秦征南越之前，即已往越。秦平南越時，趙佗任龍川縣令（今廣東龍川）。秦二世時中原紛亂，代理南海郡守的郡尉任囂，謀據地自雄，不幸生了嚴重的病症，在此危急時期，看中趙佗是個人才，便將趙佗召來，囑以後事。任囂死後，趙佗就併合三郡，自立為南越武王。

趙佗建國稱號後，其治下人民，多屬越族，趙氏得其前從居的中原人為輔，運用統治力量及華越雜處的影響，使越人沐受中國文化。越人之俗本好相攻擊，但在趙佗的教化下，其俗漸止。（註九）越人農耕方法本屬原始，趙佗自漢輸入田器、牛、馬。犁和牛的使用，使越人的農業生產方式，進入一新時代。（註十）趙氏王朝的百年統治（其中趙佗在位七十一年），使中原移民與當地越族，在文化，血統上不斷融和，其結果是越族日漸華化，而中原移民也漸與越人混而為一了。越南史家黎嵩論讚之曰：

「趙武帝乘秦之亂，奄有嶺表，都于番禺，與漢高祖名帝一方，有愛民之仁，有保邦之智，武功懾乎蠻叢（安陽王蜀泮），文教振乎象郡，以詩書而化訓國俗，以仁義而固結人心，教民耕種，國富兵強。…享國百有餘年，真英雄才略之主也。」（註十一）

漢武帝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年），平南越，設九郡，其名稱為南海、合浦、儋耳、珠崖、蒼梧、鬱林、交趾、九真、日南。南海、合浦在今廣東境內，儋耳、珠崖在今海南島境內，蒼梧、鬱林在今廣西境內，而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則在今越南北圻、中圻之地，亦即秦時的象郡。元封五年（前一〇六年），置刺史監察十三州，其隸屬交趾部（十三州中、交趾、朔方不以州稱）者，即南越九郡。自是而後，越南與中國內郡無異，中原人徙往日多。自漢武帝以來，中國對南方的開發，就很重視，而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人口，就在殖民和開發的情形下，日益增加。

當漢武帝平南越時，交趾等三郡未遭戰禍，桂林監居翁詭告甌駱降漢，其時人口計四十餘萬。（註十二）迄西漢晚期，據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所載：

交趾郡	十縣	92440 戶	746237 口
九真郡	七縣	35743 戶	166013 口
日南郡	五縣	15460 戶	69485 口

三郡合計共 143643 戶，981735 人，其中以交趾郡占最大多數，由此可以推知紅河下游之東京平原，在西漢晚期，其豐饒之農業生產，足可維持龐大的人口。

西漢晚期和東漢早期，交趾出了兩位著名的循吏。西漢平帝時(西元一年至五年)，漢中人錫光爲交趾太守，教民以中國禮義，授以衣冠之制。王莽末年，交趾閉境自守，至東漢光武帝建武五年(西元二九年)，刺史鄧讓與太守錫光會同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蒼梧諸郡內附。光武帝以宛人任延爲九真太守，治績尤著。九真文化原較交趾爲落後，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其農作方法，據後漢書任延傳註引東觀漢記所載，即「燒草種田」，蓋即今日民族學術語「刀耕火種」之法。生產方法既然落後，農產品自不敷所需，故九真人常至交趾購糧，交趾因此常致困乏。任延乃教民鑄作田器，教以耕稼之法，從事墾闢，耕地面積日廣，百姓得以充給。又當地人民無嫁娶禮法，尙係初民雜交社會，無所謂夫婦關係，父子姓氏，任延乃移書屬縣，教以媒聘姻娶，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聘禮者，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其後產子者始知種姓，生子多以「任」置名(「任」字後來轉爲「文」字)。任延更進而建立學校，導之禮義。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任延遂罷邊界之偵候戍卒。任延在職四年，及召還，九真人感其恩德，爲立生祠。論者謂交趾文風，始於錫光、任延兩太守，足證其影響之大。(註十三)

交趾的開發已頗有可觀，但一般吏治未臻清明。除少數循吏外，官斯土者，率無清行。建武十六年(四〇年)，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姊妹，怨太守蘇定爲政貪暴，舉兵反叛(按徵氏姊妹，越南人視爲民族英雄及獨立自由之象徵，越史立徵女王紀，稱頌備至)。光武帝命馬援南征，凡三年，亂平。馬援大軍所至，教化隨之，「隨山刊道千餘里……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註十四)在軍事征服之同時，輔之以善政，其於交通之開關，水利之興修，法律之制定，社會秩序之恢復，厥功甚偉。

馬援之南征，曾立兩銅柱於日南南界極邊，以表漢界。班師後，相傳有遺兵十餘家，留居漢界銅柱旁不返。

水經注卷三十六溫水條俞益期臆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返，居壽冷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尙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也。」

關於「馬流」爲馬援遺兵一說，據陳荆和先生之考證，認爲不可置信。陳先生認爲「馬流」爲 Amaravati 地名中 mara 之音譯，Amaravati 爲現今之廣南，且馬援所部並未越過九真郡無功縣或餘發縣以南之地(Henri Maspero: L' Expedition de Ma Yuan BEFEO XVIII, 3, P.23)，而東晉之壽冷縣，已經 Georges Maspero 考爲現今承天府 Choumay 角及其周圍。(註十五)愚見以爲：「馬流」爲馬援遺兵一說，縱係史學家所附會，但壽冷一地，東晉時有若干中國移民寓居該地，傳稱係東漢時期遷往者，則爲不爭之史實。

東漢晚期，交趾三郡因長期的開發，戶口較西漢晚期更顯著地增加。據後漢書卷三十三郡國志：

交趾郡	十二城	。	(戶口未載)
九真郡	五城	46513 戶	209894 口

日南郡 五城 18263 戶 100676 口

與西漢晚期相比，九真郡增加 10770 戶，43881 人；日南郡增加 2803 戶，31191 人。計九真郡人口增加為百分之二十六，日南郡人口增加率百分之四十五。交趾郡戶口雖不詳，然考諸實況，交趾郡為三郡中之首郡，土地肥美，生產進步，不僅自然增殖率較大，即中土移民亦多集中該地，人口增加率應較九真、日南為速。今以最低估計，交趾郡人口東漢晚期若較西漢晚期增加百分之三十計算，則當有戶十二萬左右，人口九十七萬餘人之譜。如此，則三郡總戶口，東漢晚期應有十八萬餘戶，一百二十八萬五千人之數。

歸納三郡人口增加的原因，約有下列數點：(一)自然增殖——農業生產的進步，婚姻及家庭制度的確立，人口自然增加。(二)中原人士南遷——兩漢戶口，長江以南各郡，都是東漢比西漢有顯著增加。譬如東漢胡廣的六世祖胡剛，在王莽之亂時亡命交趾，三國士燮的祖先也是王莽時避亂交趾的，其他不著名人士的祖先，南遷交趾三郡者，真不知凡幾。除了自動南遷的移民外，尚有罪人的流放。(三)邊徼異族的歸化——光武帝建武十二年（三六年），九真徼外蠻俚張游，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歸漢里君，安帝永和初元年（一〇七年），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註十六）這些俚人、夜郎，在中國西南各郡所在多是，其鄰接交趾三郡者，歸化後內徙雜居，亦為三郡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

### 三 六朝時期越南（交州）的富實

如前節所述，自秦漢以來，中國對南方的開發，就非常積極。交州（漢獻帝建安八年，張津為交趾刺史，表請改為州牧。此後交趾部遂通稱交州）方面。西漢末期東漢初期錫光，任延所推行的教化統治，於經濟的開發，文化的提高，有深刻而長遠的效果。自此而後，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和中央漢室的關係，與南方其他各郡相比較，已無甚麼差別。關於南方各郡的移民，對於漢代以後歷史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吳國的稱雄江東，晉的南渡偏安，完全奠基在長期的移民文化和中原內地的一致性上。交州在漢代的地位，開發雖相當積極，但一般說來，在三國以前，文化尚不能算高。中原人士移往的，若與江南其他各郡（如會稽、豫章、長沙、桂陽）相比，還是少得很多（詳見後漢書郡國志）。推究其中原因，大概是由於路程遙遠。氣候難以適應，以及民族複雜諸問題。交州進一步的開發，還應當在吳、東晉、南朝的時期。

關於六朝交州的開發，現存史料於交州戶口，賦稅諸端，極欠詳備，因此說明起來就比較困難。據晉書卷十五地理志，交州七郡，僅 25600 戶，而人口未載；又宋書卷三十八州郡志，交州八郡，僅 10453 戶，而人口未載。若與東漢晚期相比，僅當日南一郡，銳減太甚。然究其實際戶口，較之官方記載，當逾十倍以上。據三國志卷六十一陸胤傳：

「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帥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又晉書卷五十七陶璜傳：

「璜上言曰：……此州（交州）之人，讖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為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

陸胤爲吳時之交州刺史，其招撫邊境叛民即五萬三千餘家，則吳時交州八郡（合浦，珠崖兩郡不在今越南境內，其他交趾、新興、武平、九真、九德、日南六郡均在今越南境內），其戶數決不致少於東漢後期（約十八萬餘戶）之戶數。陶璜歷任吳，晉兩朝交州牧凡三十年，吳孫皓元興元年（二六四年）分置交、廣二州，此後交、廣分治，不再合併（按初次分治在吳黃武五年，即西元二二六年，旋又撤消廣州，復爲交州如故），當陶璜牧守交州任內，都督交廣諸軍事，璜上言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指自廣州以南至交州）不賓屬者及桂林不羈之輩共六萬餘戶，而服從官役者纔五千餘家，比數不及十分之一。此所以我之推論六朝交州，實際戶口逾官方記載十倍，其依據在此。

中國歷朝戶口之記錄，根據政府之田賦戶調。晉的賦稅制度（戶調式，郁田賦，戶稅合一），自南遷以後，即已大壞，東晉、南朝政府的財政收入，據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

「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著，爲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

而士族豪強的兼併，使一般農民、貧戶、淪爲部曲，家奴或佃客。這些部曲、家奴、佃客祇爲自己的主人執勞役，對於政府，則無課役的義務。從東晉以至南朝，官方紀錄中各郡戶數之銳減，實是戶調對象的銳減，而不是真正戶口的銳減。反之，六朝時期的交州，從中原人士遷往之多以及其安定富庶的情形看來，其人口比之東漢晚期，祇應增加而不會減少。

按六朝時期，江南各州盡是財富之區，交州尤以富足見稱。溯自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中原人士紛紛南遷。交州方面，交趾太守士燮保境，社會秩序安定，一時成爲避亂之區。關於士燮治下交州的安定繁榮，流寓該地的名士袁微曾盛加稱道。三國志卷四十九士燮傳：

「陳國袁微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土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境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寶融保河西，曷以加之。」

士燮的最大貢獻，不但提高越南文化水準，使與中原同列（詳見第四節），而且把交州開發建設成全國最安定繁榮的地區之一。

交州既如此安定，中原群雄均思染指，先有劉表、曹操之爭，後有孫權、曹操之爭，而士燮的應付策略亦極得宜。赤壁之戰後，曹操南進受阻，孫權遂收取交州。建安十五年（二一〇年），以步騭爲交州刺史，士燮兄弟（交趾太守士燮，合浦太守士壹，九真太守士貽、南海太守士武）相率供命，奉承節度，交州遂爲吳有。士燮事吳，極盡輸誠恭順，屢次遣使貢奉，以裕國用。三國志士燮傳：

「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瑋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椰、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士壹）時貢馬，凡數百匹。」

三國時蜀、吳兩國，其軍需資源仰給於南方者甚殷。諸葛亮平南蠻，收今日雲南，貴州北部一帶入版圖，而後率軍伐魏，出師表中有「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之語。吳國屬下之交州，其開發遠勝滇、黔，即以畜馬一端而論，趙佗時馬匹之來源，仰賴漢帝國輸入，吳時反能貢獻馬匹以奉朝廷。故交州之歲時貢奉，對吳國財政上的資助，遠勝滇、黔之於蜀國。士燮卒後，吳國中央直接控制交州，交州的奇珍異物，供應吳國宮廷的奢侈生活。三國志卷五十三薛綜傳：

「（交州）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瑋瑁、珊瑚、流離、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

東晉以至南朝歷朝，對交州之課征，均以奇珍異物之出產爲主。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

「自東晉寓居江左……諸蠻猓俚洞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

由於物產豐饒，又富奇珍異寶，故商貨所資，成爲遠方商舶輻輳之所。六朝交州之富實，與廣州齊名，爲史籍所並舉。宋書卷九十七夷蠻傳：

「若夫大秦、天竺，廻出西溟，二漢銜役，特艱斯路。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汎海陵波，因風遠至。」南齊書卷五十八蠻夷傳：

「至於南夷雜種，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瓊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物積王府。」

隋書卷三十一地理志下：

「自嶺以南二十餘郡……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

其時政府之課征，並無恆法定令（見前引文獻通考田賦考），而邊郡官吏尤易擅權，故交州地方官頗多貪墨之徒。晉書卷九十七林邑傳：

「初徵外諸國當齎寶物來質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載領日南太守，載估較大半，又伐船調炮，聲云征伐，由是諸國患憤。」

甚至有中央吏因貧求出爲交州刺史，以飽宦囊者。晉書卷六十七溫嶠傳：

「（溫嶠卒）子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出爲交州，朝廷許之。」

而帝王中竟有貪嗜財利，限使罷任之地方官奉獻者。如此上行下效，一片烏烟瘴氣，無風節紀綱之可言。資治通鑑卷一一二宋紀十一：

「上（孝武帝）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

六朝時交州叛亂頻仍，官吏貪暴以致人民怨憤，實爲最重要的原因。

#### 四 人文與學術的興盛

郡縣時期以前的越南，其文化程度原頗爲落後，自秦末及漢武帝以來，中原人徙往日多，文化始漸提高。西漢末年、東漢初年，錫光、任延的教化政治，把交州帶入一新境界，婚姻制度及學校教育的建立，在提高交州文化水準上，起了最大的作用，產生了深刻而長遠的影響。

東漢末年，交趾人才漸盛，學優仕進之風遂開。靈帝中平年間（約係中平四年，西元一八七年），交趾人李進繼賈琮爲交州刺史，是交州人才與中州同選之始。獻帝建安五年（二〇〇年），李進上言：「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登仕朝廷，皆中州之士，未嘗獎勵遠人」，辭意懇切，多所援引。獻帝因詔：「交州之有孝廉、茂才，許除補屬州長吏，不得任中州」。另一交州人李琴，宿衛京師，邀其同鄉卜龍等五、六人爲正元。後朝廷復納李琴之請，以交趾茂才一人爲夏陽（陝西韓城）令，李廉一人爲六合（江蘇六合）令。李琴後仕至司隸校尉，日南人張重官至金城（甘肅皋蘭）太守。（註十七）交趾人文之盛，於此可見。東漢季世，朝廷腐敗，國家多故，交州官吏任命常不得其人，擅作威福，侵虐百姓，一再激起事變。及朝廷擢用越人治越，李進以交州人任交州刺史，交州地方政局乃獲長期安定。漢末中原大亂，惟交州獨稱淨土，蓋緣於此。東晉以降，交州地方人才輩出。晉宋之際，交趾人杜瑗、杜慧度、

杜弘文祖孫三代，相繼爲交州刺史凡三十年（三九九年至四二七年），政績斐然，嘉惠鄉梓，貢獻極大。（註十八）宋齊之際，交趾人李長仁、李叔獻兄弟，相繼據州叛命，自領州事，計十八年（四六八年至四八五年）。（註十九）梁陳之際，又有交趾人李賁、李佛子之相繼叛亂，建國稱號，使陳朝政治勢力，始終不能進入交州。（註二十）綜上所述，在在顯示六朝時期的交州地方人才，其學養和才能已足與中原人士分庭抗禮，並駕齊驅。

六朝時期，交州的文風和學術也極爲興盛，而中心人物，就是保境安民的交趾太守士燮。士燮，蒼梧廣信人，其先世爲魯國汝陽（山東寧陽）人。少時游學京師洛陽，從潁川大儒劉子奇，治左氏春秋、通尚書大義，其治學極爲簡練精微。（註二十一）中國的通儒每能學以致用，經國利民，而士燮不僅是一位學問優博的儒者，且是一位達於從政的能吏，學術與政治的結合，所產生的效果，遂使漢末、三國時的交州，成爲全中國政治安定，文化昌明的地區。越南史家對於士燮在提高文化方面的貢獻，稱頌備至。黎嵩越鑑通考總論贊曰：

「士王習魯國之風流，學問博洽，謙虛下士，化國俗以詩書，淑人心以禮樂，治國踰四十年，境內無事。」

又大越史記外紀卷三士紀：

「史臣吳士連曰；我國通詩書、習禮樂，爲文獻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豈特施於當時，而有以遠及於後代，豈不盛矣哉！」

士燮保境時期，避難交州的名士約百數，士燮均以禮相待。此等名士於交州文化學術之勃興，極具影響。其中如桓曄、許靖、許慈、劉熙、程秉、薛綜等，皆望重儒林，有記傳可稽，其在交州，或以學問、或以德行、或以事功，傳留後世。後漢書卷三十七桓曄傳：

「（獻帝）初平中，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趾，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

三國志卷三十八許靖傳：

「孫策渡江，走交州以避其難。……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群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又同書卷四十二許慈傳：

「許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

又同書卷五十三程秉傳：

「程秉……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孫）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

又同書卷五十七薛綜傳：

「薛綜……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

百越先賢志卷三劉熙：

「劉熙字成國，交州人，先北海人也。博覽多識，名重一時，薦辟不就，避地交州，人謂之徵士，往來蒼梧、南海，客授生徒數百人。乃即名物以釋義，惟揆事源，致意精微：作釋名二十篇，自爲之序，又著諡法三卷，皆行于世。建安末，卒於交州。」

士燮之招納名士，並不僅限於儒林。有牟子其人，將母避世交趾，以著理惑論（即牟子）名于世。理惑論是佛教的要籍，牟子所表現的佛法，乃漢晉間佛教過渡時期精神轉換的代表。按牟子序中，叙交州刺史朱符（漢靈帝中平四年至獻帝初平元年）時事，又言「太守聞其守學，調請置吏，牟子時年方盛，志精於學，無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

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查當時蒼梧太守係史瓚，交趾太守是士燮，牟子序原文中所述「謁請署吏」「使致敬交州」等事，係在其「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後，則序中所說之太守，似指蒼梧太守。但觀於士之招納士人，且與牟子同係蒼梧人，則牟子或為士燮所激賞，而與任用程秉，薛綜為吏，其意正復相同，故疑牟子序中之太守或指士燮。蓋牟子序文中云及：「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於此可見其時之交州，不僅思想自由，且士燮於當世奇材異能之士，無論儒、佛、方術均所招禮。考佛教始入中國，最初與方士、道術相結合，故佛老並祀。及東漢桓靈之世，出經較多，教法方稍直溯本源，竿融大造浮屠之祠，已不兼祀黃老。牟子所作理惑論，公然黜百家經傳，斥神仙方術，使佛教自立，實為佛教時代精神的一大轉變。牟子早年修經傳諸子，誦五經，讀兵法及神仙不死之書。據其自言，曾信方術，亦嘗學辟穀之術，後解大道而信佛。牟子之所以信佛，則由於好玄理，嘗謂「視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觀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謁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故又自稱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言，是已棄道術而談玄理。漢代佛教，附庸方術，魏晉釋子，雅尚老莊，觀牟子之思想，恰為過渡時期的人物。牟子生平學問信仰，兼收並蓄，常有轉變，實充分表現交州五方雜處，交通頻仍的地方精神。(註二十二)

關於牟子理惑論一書，近世東西方學者於其真偽問題，頗多聚訟。疑為偽者有梁任公（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四冊，佛教之初輸入，附錄三，牟子理惑論辯偽），法人亨利，馬司帛洛（漢明帝感夢遣使事考證 BEFEO. X, 1910）、日人常盤大定（大正九年一月，東洋學報十卷一號，漢明求法說の研究）。謂為真者有孫貽讓（籀膏述林），法人伯希和（一九二〇年通報，牟子譯文序），周叔迦（牟子叢殘），余嘉錫（燕京學報二十期，牟子理惑論檢討），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然細釋疑為偽書者諸說，多不確實（伯希和、周叔迦駁之甚詳）。而牟子序文中所載史事，不但與史事符合，且可補正史之闕，其非偽書，實無疑義。又六朝佛教偽書，言及漢代佛法，類皆張大其辭，而牟子所言惑者諸問，證明其時佛法方在萌芽，若係偽作，必不肯直書若此。(註二十三)

自牟子以來，交州佛法邵已大興，稍後又有康僧會其人。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居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勵行甚峻。以吳赤烏十年（二四七年）至建業，因舍利之感應，孫權為之立建初寺，由是江南佛法大興。(註二十四) 據近世學者之考證，江南佛法之興，始自黃武年間，早於康僧會約二十年，固不能全歸功於康僧會。(註二十五) 然康僧會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在交趾出家等事實，要可證明吳時交州佛教之興盛，竟進而影響江南佛教之傳佈。康僧會後，又有支疆梁接，西域人，以孫亮五鳳二年（二五五年）於交州譯法華三昧經。總吳之世，四主五十九年，譯經者凡五人，其中康僧會來自交趾，支疆梁接於交趾譯經。(註二十六) 五人中有二人與交趾有關，吳時交州佛法之興盛，於此更多一有力證明。

士燮卒後，吳國直轄交州。而其先寄寓之名士，因魏、蜀、吳三國之徵聘，北返者甚多。然學術既蔚成風氣，故文風興盛，歷久不衰，即如文臣徙謫交州，亦有講學著述而不倦者。三國志卷五十七虞翻傳：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權……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為老子、論



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同書卷五十二顧譚傳：

「(顧雍之子)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趾。」

南朝時中原士人生活奢靡，論學則探究老莊，推崇易理，清談之風大盛；為文則牽拘聲韻，彌尚綺麗，浮華遂以成俗。而交州方面，學術文章之風尚，與中原亦頗近似。宋書卷九十二杜慧度傳：

「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老莊。禁斷淫祀，崇修學校。」

資治通鑑卷一五八梁紀十四：

「有并韶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吏部尚書蔡搏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

杜慧度以交州人繼其父為交州刺史，崇好老莊，求自然簡樸的生活，玄虛曠達，清儉自守兼而有之，其風格顯較江南士人為高。并韶以交州人長於文學，求官被抑，蓋門第之見使然。後并韶與李賁合謀起事，為交州士人心懷大志，恥居人下，欲與中州相競的實例。梁陳之際，交州地方的獨立運動，其領導人物類皆籍隸交州而在中原仕不得志的寒士。

- (註 一) 周時稱駱越，秦時曰西甌，見史記卷四十三趙世家，正義引輿地志文。漢時稱南越、西甌，或西甌駱，見史記卷一一三南越尉佗列傳、漢書卷九十五南粵傳。
- (註 二) 詳見芮逸夫著中國民族與越南民族(中越文化論集)。
- (註 三) Henri Maspero: Etudes d' Histoire d' Annam (1) BEFEO (河內法國遠東學院校刊) XVIII, 3, P. 9~10
- (註 四) 凌純聲著南洋土著與中國古代百越民族(學術季刊第二卷第三期) 凌師所作東南亞古文化的民族學之比較研究，計列文化特質五十種。此文擇列其中十種文化特質，認係古代百越民族所共有。(1)祖先崇拜 (2)家譜 (3)洗骨葬 (4)銅鼓 (5)干欄 (6)龍舟 (7)鑿齒 (8)文身 (9)食人與獵頭 (10)洪水故事。
- (註 五) 淮南子卷十八人間訓。
- (註 六) L. Aurousseau 著 馮承鈞 譯 秦代初平南越考，頁 102~103
- (註 七) 同上，頁 105
- (註 八) 漢書卷九十五南粵傳。
- (註 九) 同前傳；「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同書卷一高帝紀十一年條；「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滅，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佗為南粵王。」
- (註 十) 同註八南粵傳；「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上引之文為趙佗自漢輸入田器，牛馬之明證。又按自春秋以降，鐵犁已為中國田器中之主要工具。論語雍也篇；「犁牛之子騂且角。」孟子滕公上篇；「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 (註十一) 越鑑通考總論。
- (註十二) 同註八。
- (註十三) 後漢書卷七十六任延傳，卷八十六南蠻傳。
- (註十四) 同前卷五十四馬援傳。

- (註十五) 陳荆和著林邑建國之始祖人物(學術季刊第五卷第二期)。
- (註十六) 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傳。
- (註十七) 大越史記外紀全書卷三東漢紀。
- (註十八) 宋書卷九十二杜慧度傳。
- (註十九) 資治通鑑卷一三二宋紀十四, 南齊書卷二高帝紀, 卷五十八扶南傳。
- (註二十) 資治通鑑卷一五八梁紀十四, 大越史記外紀全書卷四。
- (註廿一) 三國志卷四十九士燮傳。
- (註廿二) 湯用彤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第75—80頁。  
引文據牟子理惑論。
- (註廿三) 同上註。
- (註廿四) 慧皎高僧傳初集卷一。
- (註廿五) 湯著佛教史, 第135—136頁。
- (註廿六) 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二。

## DEVELOPMENTS IN VIETNAM DURING THE CH'IN, HAN AND SIX DYNASTIES

Lü, Shih-peng

The Vietnamese people are descended from a western branch, called Lo-yüeh(駱越), of the Po-yüeh (百越) people who moved from southern China to the Tonkin and Annam areas of present Vietnam. Prior to the Ch'in (秦) dynasty, they retained a tribal social system and primitive cultural character.

In 214 B. C. the Ch'in regime conquered the Nan-yüeh (南越) territory (including the present Kuangtung, Kuangsi and Northern Vietnam), and created a province called Hsiang-chun (象郡 Elephant province) in Vietnam, which extended to the point now called Cape Varella (12° 53' N. 109° 27' E.). The Ch'in established an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sent Chinese emigrants, most of them convicts, to settle in the area. These emigrants carried Chinese culture and customs to the native people.

At the end of the Ch'in dynasty, a Chinese official, Chao T'o (趙佗), made this territory a kingdom called Nan-yüeh. The Chao dynasty ruled for ninety seven years (207-111 B. C.).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s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the introduction from China of the water buffalo and plow for use in agriculture and the reform of many tribal customs.

In 111 B. C. Han Wu-ti (漢武帝) conquered the Chao Kingdom and divided it into nine provinces. Three provinces, Chiao Chih (交趾), Chiu Chen (九真), and Jih Nan (日南), are located in present Vietnam. The Han continued to encourage Chinese settlement of Vietnam and the native people received further Chinese influence.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first century A.D. a few model officials, such as Hsi Kuang(錫光) and Jen Yen(任延), established the marriage system and school education. Subsequently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Vietnam was rapid and approached the level of the central Chinese provinces.

The population increased from 400,000 in 111 B. C. to 980,000 a century later (shortly before the birth of Christ), and reached more than 12,000,000 by the end of the second century A. D., largely owing to economic and social innovations introduced from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a famous official, Shih Hsieh(士燮) ruled Vietnam, then called Chiao Chou(交州), as a semi-independent territory (187-226 A. D.). Among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immigrants at this time were many educated Chinese who fled to Vietnam to escape from the general warfare in China. This single peaceful region was thereby brought to a cultural and scholarly level equal to that of other Chinese provinces.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Chiao Chou was very rich and prosperous, and gave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Wu (吳), Chin (晉), Sung (宋), Ch'i (齊), and Liang (梁)

dynasties.\* Unfortunately, many officials who ruled Chiao Chou from the later Han dynasty to the Six dynasties were avaricious in grasping power and money, and rebellions occurred frequently. However, through a long period of development, Chiao Chou became an area with a high level of culture, and an important center of Buddhism.

Owing to the increase of wealth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education, the Vietnamese claimed leadership within their native land and asked for equality in holding official positions in the Central 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s. Consequently, some talented men became officials in their local governments and in other Chinese provinces, whereas others who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low ranks became leaders in rebellions against Chinese rule. Some scholars became famous historical figures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classical heritage of China.

\* During the Chen (陳) dynasty, Chiao Chou became independent and was outside the contro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until the early Sui (隋) dynasty.